

「臺灣民主發展 史系列講座」： 徐斯儉、王振寰 廖達琪、陳儀深 蕭阿勤、王甫昌

李宗洋、邱鐘義、許秀孟、嵇國鳳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國史館今（民國 102）年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合作，推出「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 10 位學者專家蒞館演講，從各個不同面向探討戰後臺灣的民主轉型經驗、過程與成果。

臺灣的民主發展成就已在華人世界樹立典範，自由民主憲政體制的生活方式，成為國人重要的集體資產；然而「寧靜革命」下逐步、分期完成的民主轉型，使得我們不能不想起走過的坎坷路程。隨著 1990 年代以後的民主化浪潮出現、人民主體意識興起，政黨輪替、政府對政治案件受害者進行道歉、賠償，連帶釋出為數龐大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案件的檔案資料，不少學者投身於此，重建了許多我們過去所不瞭解的歷史事實。

對於得來不易的民主成就，國史館擬透過本系列講座，廣邀各界專家學者從學術的、歷史的與多學門的角度出發，不分黨派色彩，深入剖析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涉及的政黨、政商、族群、文學等議題，重新審視臺灣民主發展艱辛路程，深化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認識；同時冀望學術研究成果，能藉此演講活動走入社會。

本系列講座各場次時間如後，已於 11 月 30 日圓滿結束。楊翠、吳乃德兩位教授講座內容，將於下期刊登。

系列講座場次：

場次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演講題目
1	03/16	張玉法	中央研究院院士	民主政治在臺灣：中國國民黨角色的檢討
2	05/18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院士	臺灣民主轉型經驗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意涵
3	06/01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黨國體制與民主化——兩岸的比較
4	06/15	王振寰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	政商關係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轉變
5	07/06	廖達琪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立法院與臺灣的民主發展
6	08/03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實相與虛相——60年來重要史實的回顧
7	09/14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戰後世代、民主政治與文化變遷
8	10/19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族群議題的發展與臺灣民主化的關係
9	11/16	楊 翠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文學的介入與反抗——戰後臺灣文學中的威權體制與民主意識
10	11/30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轉型正義與民主文化

徐斯儉：黨國體制與民主化——兩岸的比較

徐斯儉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其專長領域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發展與變遷。本次演講是以其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熟稔度，回溯與比較兩岸在黨國體制上的異同。

黨國（party-state）是一種政權型態，黨和國是合一的，一般人認為中國國民黨和中

國共產黨都是黨國威權政體，而徐教授觀察兩黨長期的發展，認為國民黨的統治並非政治學上嚴格定義的黨國威權，更達不到極權政體對社會的強力穿透性。黨國體制在中國的起始點，可以追溯到國民黨在 1920 年代的聯俄容共政策，其吸收蘇聯的黨國政治理論，建立黨軍，施行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統治模式。然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比較接近一種以蔣介石為核心的軍事控制。到了蔣經國時代，黨的作用開始轉變，

在中央更多是以政策領政，而非制度性地控制政府。在地方上國民黨的作用則更像一個選舉機器。

而中共在建國初期的政權型態是極權式的，有強烈的意識型態，企圖徹底的改造社會，並壟斷國家權力、武力、經濟、媒體、思想與社會組織等等。黨是做為統治的工具，而非僅為選舉機器。因此當我們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時，中共的黨章，比起其國家憲法，更能體現當今中國大陸的統治本質。



徐斯儉教授（攝影／黃翔瑜）

比較國民黨與中共在兩岸的統治型態，可以分別從幾個面向觀察：（1）對國家的控制；（2）對選舉的控制；（3）對社會團體的控制；（4）對媒體的控制等。首先，對國家的控制方面。國民黨黨部是與政府平行的，但不能制度化地控制政府，在 1980 年代以前，主要是透過特務此種特殊單位來控制各機關。而政府機構間仍有一定的權力

制衡關係，例如立法院仍得以發揮監督的功能，而有邁向民主化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則有嚴密的黨組織，黨領導一切，用黨的力量控制國家與社會。中共在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單位皆設置黨委員會，並在各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成立黨組。黨委和黨組皆在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討論和決定該單位的重大問題。

其次，對選舉的控制方面。國民黨的各級黨部負責提名參選人名單，但由黨提名之外，並不阻止其他人員登記參選，因此常有脫黨競選的情形發生。此外，非國民黨人士也可參選地方選舉以及立法委員的增額選舉。在 1980 年代時醞釀成的「黨外」力量，即是透過此種選舉參與的過程，互相串聯，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力量，並為反對黨的雛形。中共在選舉過程中，則以黨的力量嚴密控制與篩選。如人大代表的選舉，在初步提名候選人之後，還有一個正式候選人產生的步驟，黨或組織在這個階段發揮篩選作用，許多候選人被「醞釀」或「協商」處理。而中共實施所謂的「黨內民主」，在基層鄉鎮黨委書記的產生過程中，允許一定程度競爭，但是候選人仍都是黨員，因此非中共的力量，難以透過選舉集結為另一股政治勢力。

再次，對社會團體的控制。國民黨採統合主義，將資本家與勞工團體代表納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政治反對力量因而常引為互

相奧援，對威權政體形成挑戰。而中共因為有極權時代的群眾團體（工青婦）以及官辦社會團體（GONGO），相對國民黨對社會掌握更深。此外中國大陸最大的利益集團，是在體制內形成壟斷，他們不需要另外組織，而是求助政權打壓其他社會團體，來維持其壟斷地位。

最後，對媒體的控制。國民黨不是透過黨來管媒體，而是透過警總。控制方式則是外部控制，而非制度化的內部控制。中共對媒體是由各級黨委下的宣傳部來管理，由各級宣傳部下令給各媒體編輯，黨及政府各部門直接經營媒體，但由各媒體自負盈虧。2013年年初發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即是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涉嫌擅改新年獻辭，而引發該週刊編輯人員的連署抗議，突顯了中國大陸新聞審查制度中「黨」的干預性。

經過這四個面向的比較，可以見得國民黨與中共的統治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徐教授認為臺灣走向民主化的發展歷程，不能比之於中共的民主化方向，也就是說，國民黨的過去，不能說就是中共的未來。

王振寰：政商關係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轉變

王振寰教授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本次演講的主題是臺灣政治發展中的政商關係。此議題影響當代臺灣

的政治走向甚為鉅大，王教授在本演講中做了相當清楚的說明。

王教授首先對政商關係提出幾個觀察視角，例如經濟層面、政治層面以及社會公平的角度等等。在經濟層面上，政府和企業之間存在帶領或是合作的關係，以帶動經濟發展；政治層面上，政府與企業常互相為用，政府常須拉攏企業家以維持其統治的穩定。反過來，企業也會試圖影響國家決策，以擴大其利益。而用社會公平角度來觀察的話，政商之間是否存在特殊利益，以及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否合理，是檢驗政商關係的理性發展程度。

在臺灣的政商關係，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政府扶植私人資本時期」（1950-1980年代）、「大小伙伴時期」（1980-2000年）、「政商關係的私人化」（2000年以後）等。在第一階段政府扶植私人資本時期，是在戒嚴、黨國體制下，國民黨採威權統合主義，將所有民間社團都納入其控制底下，主要有全國總工會、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和工商協進會等。各主要民間團體也都安排黨團幹部來領導，並將其社團理事長拉入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以緊密其關係。此外，國民黨也發展出與地方派系合作的侍從主義。其利用經濟資源做為酬庸，或賦予本地精英壟斷經濟利益，來交換對其政治上的忠誠。例如特許地方派系擁有地區性的獨佔事業，如信用合作社、農漁會的信用部門，以及汽車客運業等，形成地方政商資

本，權錢相互加強的現象。地方勢力之外，國民黨從 1950 年代開始，也因應政策扶植不同的產業，使某些特定產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例如台塑、國泰、新光、統一、大同、遠東、中信等等企業集團，都由政府扶植而來，在程度不等上左右了現今臺灣的經濟發展。



王振寰教授（攝影／陳世局）

到了 1970 年代中期之後，臺灣的政商關係進入大小伙伴關係的轉型期，主要原因包括社會氣氛的轉變、資本日趨全球化的流動以及反對力量的壯大等等。政治反對力量雖然始終存在，但在 1970 年代後才逐漸集結，並且結合社會議題，如環保、反核等訴求，而與社會運動包裹在一起，威脅到國民黨的權威統治。而地方勢力也不滿被限制在地方政治，欲向中央政治突破，因而利用中央民代增補選與地方首長定期改選的機制，擴張其力量，使國民黨有了政權的競爭者。

而在資本日漸全球化，資金流通越來越頻繁時，私人企業面對國民黨的經濟控制也益發不滿。特別是 1988 年 1 月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其權力極不穩定，於是聯合地方派系、資本家、反對運動、社會運動等反過來打擊國民黨中舊有的統治勢力，造成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使黨外人士在後續的選舉中獲勝，並逐步取得國家統治的權力。相對的，對工商團體的控制也因此鬆動了，資本家在黨內的地位節節升高，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也走向企業化經營，設置「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與財團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到 2000 年時，國民黨的黨營事業總額已經高達 4,310 億，因而招致黨有財團化的譏諷。

2000 年 5 月後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由於其與企業家關係不深，採取了幾個措施來建立與資本家之間的連結，使臺灣的政商關係逐漸走向私人化的現象。其一、民進黨利用執政優勢，借機拉攏資本家，形成個別酬庸與籠絡的政商網路；以金融改革之名癱瘓農漁會信用部門的功能，斷絕國民黨地方派系的選舉資金來源；透過選舉提名制度，建立民進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派系侍從關係。

其二、打破既有的工商團體代表。作法有將「三大」工商團體：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稀釋成「六大」工商團體：包括有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中小企業協會、工業協

進會、臺灣區電機電子公會；安排親民進黨的東元電機董事長黃茂雄接續中信集團的辜濂松出任工商協進會理事長；積極扶植親民進黨的新興工商團體，例如由戴勝通擔任理事長的中小企業協會，和李成家推動成立的工業協進會等。

其三，個別收編資本家。民進黨首先清算國民黨的黨產，要打破國民黨與資本家的關係。再藉著民營化釋股和公共工程的承包，來給予親綠企業家實質的經濟利益。同時陸續更換國營事業的官股代表，以親民進黨人士進駐國營企業董監事高層，以國營資本拉攏民營企業。

民進黨如此操作私人化的政商關係，終究迸出貪腐的大弊案。陳水扁在總統任內即利用政府推動金融機構整併的「二次金改」機會，先後向國泰金控蔡宏圖收 3 億元，向元大證券馬志玲收 2 億元，並協助兩大家族取得較有利的整併地位。在特偵組公布的偵辦結果中，指稱陳水扁的不法所得高達新臺幣 31 億元（約 1 億美元），暴露出臺灣政商關係的危機，也形同退回第三世界的裙帶主義類型。

總結政商關係，它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即使先進民主的美國，都訂立了諸多法案來監督政商關係，但仍無法完全避免貪腐的現象。而歷史經驗已給了我們諸多警惕與防範方式，除要求政府與企業各項資訊、流程的透明化之外，亦要強化公權力，有如香港的廉政公署機制。但最要緊的，公民社會

絕對有監督的必要和重要性。提升公民的道德素養與社會責任，仍是一條必須繼續努力的道路。

廖達琪：立法院與臺灣的民主發展

廖達琪教授現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長為國會研究。本次演講為聽眾剖析立法院和臺灣民主發展之間的關聯。

廖教授首先以立法院的現狀破題，詢問聽眾對於現在立法院的印象為何？並播放了一段前陣子立法委員為服貿協議爆發肢體衝突的影像。在場多數的聽眾表示對立法院印象不佳，甚至有人認為應該廢除立法院。儘管如此，廖教授在演講中提醒我們，在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中，立法院所扮演的角色仍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廖教授首先提出國會角色與政治系統的民主發展間呈現一種辯證關係。以臺灣為例，存在於政治體系的立法院，在威權統治下逐漸吸收反對力量，等到反對力量壯大時便引發質變，使得威權統治逐漸朝向民主化方向調整。立法院在此過程中，伴隨著外在政治環境和自身權力的消長。廖教授生動地以「睡獅」、「醒獅」和「吼獅」比喻立法院發展階段特色。

行憲後的立法院成立於 1948 年，當時中國大陸尚未淪陷，立法委員仍由全國選



廖達琪教授（攝影／黃翔瑜）

出，但一年後政府即播遷來臺，大部分立法委員跟著來臺。由於國民黨政權對於「法統」的堅持，這批第一屆的立法委員始終不必改選。隨著歲月的消逝，這批立法委員逐漸凋零，1969年起，政府開放增選立法委員11人，為立法院注入新血輪，1972年開始定期立法委員增額補選，1986年開始有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進入立法院，立法院出現了反對黨，1991年第一屆立法委員全面退職，重新選出第二屆立法委員。

廖教授指出，民主化包含三樣指標：定期選舉、充分參與和民權保障。要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是一個長時間的進程，又可以細分為：硬性威權、軟性威權、快速民主化和民主鞏固等四個階段。由前述的立法院簡

史來看，1950年到1972年間可視為硬性威權時期，此一階段立法委員沒有改選，只在1969年舉辦過一次增選；1972年開始定期舉辦增額立委補選舉時，可視為軟性威權時期；1986年以反對黨之姿現身的民進黨成立後，標誌了快速民主化時期的開始；1991年第一屆立法委員的全面退職，象徵民主鞏固階段的到來。這四個階段中，前三個階段正對應了「睡獅」、「醒獅」和「吼獅」的角色；最後的民主鞏固階段，廖教授以「獅吼」來譬喻立法院的影響力道。

關於立法院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自身變化，廖教授採用了「中央民意機構改組問題」、「解除戒嚴」、「擴大政治參與」、「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含組黨自由）」、「人權保障」、「行政中立和軍隊國家化」，以及「其他」七項觀察指標，透過統計分析立法委員對於此七項與民主相關議題的質詢，作為觀察立法院角色的變化依據；同時以《聯合報》、《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等媒體對於同樣議題的報導作為對照組。藉由這些統計和觀察，廖教授發現在硬性威權階段中，立委諸公們對這些民主議題的關注甚少，僅占全部質詢議題的8%；但隨著立法院新血輪的注入，在軟性威權與快速民主化階段中，迅速上升至23%和27%；民主鞏固階段，由於立法委員們的關注議題改變，數字降到9%。和報紙對比的數據也顯示，除了在軟性威權階段，立法院關注的民主議題和報紙報導落差較大外，其餘時期

立法院和民意關注的標的差距不大。

最後，廖教授認為只要在政府體系中有立法院的存在，它就會默默地發揮功效，現在的立法院儘管不夠完美，仍在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有其貢獻。更重要的是，身為選民的我們不能對立法院灰心，應負起公民責任，用我們的選票監督每一位自己所選出的立法委員，讓立法院繼續發揮其功效。

陳儀深：「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實相與虛相——60年來重要史實的回顧

陳儀深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攻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研究等。



陳儀深教授（攝影／陳世局）

在本次演講中，陳教授表示：戰後諸多重要需要關照的史實，必需提及「舊金山和

約」、「中日和約」、1971年前後的聯合國席位問題、美國的「臺灣關係法」，以及李登輝時代的民主改革。

陳教授表示從日本戰敗後開始，中華民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接收臺灣，但這只是軍事、政治的接管，並未提及主權轉移。1942年臺籍精英（如張邦傑等人）曾向國民政府提到收復臺灣的主張，此後這類論述便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看待臺灣地位問題的基本態度。但若從外部來看臺灣接收，就會有不同的觀點。關於臺灣地位問題，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是很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他的《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中便指稱臺灣被美國政府紊亂無章的政策所出賣，而查諸《美國外交文件》（FRUS）也能印證此說。美國政府主張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而言，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就國際法的角度而言，臺灣地位仍待對日和約來確定。不過即使是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美國政府內部仍是意見分歧的。美國政府對於究竟是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還是扶植臺灣人政權仍是模稜兩可；軍方則立場一貫地採取強硬的反共態度，主張防衛臺灣；至於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則是延續了開羅、波茨坦兩宣言的基調，承認中華民國對福爾摩沙島行使權力的現狀，1950年1月5日表示「福爾摩沙的資源已足能使中國軍隊獲得保衛該島所必須的物資」，明白表示美國將從臺灣問題中抽手的態度。

韓戰後，美國對臺灣的態度雖然轉趨支持，但早在韓戰爆發之前，美國內部對於援助臺灣一事，便已有所考慮。例如：麥克阿瑟早在韓戰之前，便已從軍事、政治的角度，向美國政府建議防衛臺灣以免落入敵對國家之手，並認為戰爭期間盟國承諾在戰後把臺灣交給中國的政治情勢，與現在已經完全不同，在道義上美國應給予臺灣人民不受共產集團國家制錮的環境下，發展自身政治前途的機會。因此當我們說到「韓戰救臺灣」，認為韓戰一發生，一切都改變了，顯然也不是那麼地精確。

韓戰雖然不那麼絕對，完全改變了一切，但韓戰確實讓美國軍方與國務院意見趨於一致。韓戰爆發後三天，杜魯門總統迅即宣布第七艦隊協防臺灣，防範中共對臺灣的攻擊，同時也制止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海、空攻擊。為了便於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Dean Acheson）國務卿因而公開宣言：「福爾摩沙將來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締結，或是聯合國的考慮」，此已揚棄半年前信誓旦旦宣稱福爾摩沙已成為中國一省的說法。

相對於美方的態度，中華民國政府縱然理解其用意，但也不可能坐視美方這一片面宣言對其在臺統治合法性的傷害，因此透過外交部長葉公超重申：「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的表述對於臺灣未來地位之決定並不具影響力，自也不影響中國對臺灣的

主權」。

因此從外部的角度來看，美國承認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回事，臺澎地位是否已經屬於中華民國則是另一回事，這點可從對日和約的擬訂過程中看出端倪。最初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提出具有建議性質的對日和約七項原則時，便有「凍結臺灣島地位」的主張，企圖將臺澎，連同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的地位，透過和約或交聯合國大會決定。但最終的「舊金山和約」文本則更加模糊地改為由日本放棄主權，而不提及臺灣主權的歸屬問題。

但是，由於英、美對舊金山和會中的「中國」代表意見分歧，中華民國政府因而無緣出席和會，失去多邊條約的簽約權，只好與日本政府訂定雙邊條約。不過「中日和約」（全名：「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只是重述「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業已放棄對於臺灣、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而未明定交給何方。因此 1952 年外交部長葉公超在立法院的報告中才會提到：「微妙的國際情勢卻使臺、澎並不屬於我國所有。在目前情勢下，日本沒有權利把臺、澎轉移給我們」，因而主張「在中日雙邊和約，我們設法規定在臺、澎的居民及法人用中國籍，這項規定可以彌補現在到未來臺、澎歸還我們之間的空檔」，作為補救的方法。

至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在 1949 年之後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而產生爭

議。戰後以來由於中華民國有美國政府的支持，因此仍能保有在聯合國的席位。美國力保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手段，在 1950 年代是採取「緩議」，使之無法成案。到了 1960 年代阻止成案的方式不再有效時，改以透過「重要議題案」，以較高門檻阻止表決通過，然而至 1970 年代這樣的方式便受到挑戰。1970 年阿爾巴尼亞在聯合國第 25 屆大會中領銜提出排除「蔣介石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代表權決議案，首次取得多數支持，為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席位提出警訊。因此 1971 年 3 月 9 日美國國務院便考慮以「雙重代表權」保障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籍，以維持現狀。事實上，最初蔣介石對於「雙重代表權」的提議並非強烈抗拒，只是其底線在於保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但以當時的國際氛圍來看，「雙重代表權」並不受到普遍地反對，問題在於中華民國若必須保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則不受到國際各國支持，因而中華民國最終以「漢賊不兩立」為詞，宣布退出聯合國。

而臺灣社會的發展，在 1970 年代透過《大學雜誌》發聲批判，但筆觸仍流露出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大中國論述方式，並沒有見到濃烈的臺灣共同體的想像，而且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也容不下以臺灣為主體的公共意見表達。以後隨著民主化的發展，特別是受到重大政治案件與黨外勢力的發展，以臺灣共同體想像作為基礎的論述，在

1980 年代才逐漸出現明確化的現象。這股臺灣主體意識的潮流，隨著解嚴與李登輝總統的執政，而得以獲得更加深遠的發展，逐漸將中華民國的共同想像設定在臺澎金馬的範疇之中。這點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調查，以臺灣為單位的想像共同體，在近 20 年間逐漸成長上升的趨勢，也可獲得印證。

蕭阿勤：戰後世代、民主政治與文化變遷——臺灣 1970 年代

蕭阿勤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本次演講係由「世代」的研究視角切入，探討戰後臺灣民主發展與文化變遷逐步走向本土化的轉型歷程。



蕭阿勤教授（攝影／林正慧）

首先，蕭教授自陳其歷來研究戰後臺灣政治、文化的核心關懷與動力來自於「希望

對我們現處的社會，以及上一代所走過的歷史的路作一個回顧。除非我們理解自己過去走過的路，否則不太容易理解現在，反之亦然；對現在的看法，同樣會影響我們重新去理解過去。」因此以當前臺灣政壇時常論及的「世代交替」問題作為引子，指出過去四十年來，尤其是 1970 年代以來，臺灣自由化、民主化的關鍵性人物，主要由戰後世代的年輕人擔負起挑戰與被挑戰者的要角；然他們的集體認同在言行上發生的轉變，即是由統治者所陶冶「追求現代中國」過渡到「回歸鄉土現實」的一代，蕭教授稱呼他們是「回歸現實世代」。原來國民黨意欲形塑、培養成為認同中國的他們，其所關懷的核心價值，不單只是認同傳統上的中國，更背負著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國恥創傷下，心理的層次壓力，企圖更進一步追求中國在政治、文化上的現代化。外在制度背景上，1960 年代臺灣進入高等教育擴張的階段，統治者將現代化的教育作為國家發展利器的同時，也在培養社會上潛在的不滿者。這批戰後世代有意識地對自己與上一代的思考觀念開始產生了區隔與不滿，企圖反抗舊時代、舊世代的世代衝突因而浮現，甚至對國家未來的走向感到茫然，就如張系國於 1964 年寫下的一句話：「以後該怎麼辦？」

但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的壓力之下，要提出與政府不同調的異議性言詞實異常困難，在此「沉默的一代」之間，膽敢於 1960 年代公開批評政府的，主要是來

自於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尤其是殷海光，以及胡適、傅斯年、雷震等人所創立的《自由中國》雜誌，他們代表了第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公開挑戰。同時，被壓抑的、看不見的，還有屬於本省人在政治上的挑戰，例如 1964 年彭明敏等印製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以及 1966 年呂國民等秘密組織「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早在策劃階段就被取締和逮捕了。在此氛圍下成長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國族認同自然導向以發揚「現代中國」為己任的目標追求上。呂秀蓮就是一個非常典型、也很清楚表現出戰後世代所思所想的例子，其於 1974 年出版《尋找另一扇窗》一書〈再版序〉中指出：「我已體認到生為中國人，死必為中國鬼的事實，我於是更加努力於使自己作一個中國人……斯時斯地，你我所追尋的，所需要追尋的，不正是一條現代的、邏輯的、也活化的中國之路嗎？」

然而 1970 年代的國際政治瞬息萬變，1971 年的保釣運動、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席位、1972 年尼克森總統簽署〈上海公報〉、臺日斷交等，一連串的衝擊、創傷，導致原來由國民黨主導的現代性中國所形構出的世界觀漸次瓦解、崩塌。戰後世代在覺醒的過程中，開始轉向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從土地、人民與鄉土情懷間，抒發其對改革的欲望、要求挑戰的路徑，並嘗試從創傷中開創出人生與國族認同上的新方向。至此，1970 年代臺灣所謂「回歸現實」世代於焉

成形。此批被壓抑世代的覺醒，是把自己放入長遠的歷史過程的角度來進行自我定位。舉例而言，將 1970 年代以來的外交挫敗，歸咎於近百年來中國國族悲慘的命運，並藉由大歷史的敘事來陳述自我覺醒的立場，以個人對世代位置的自覺與行動出發，進一步去改革社會、乃至於整個國家發展的現況。在政治方面，要求回歸現實，提出改革內政、建國優先、民主至上的呼籲；文化上也開始回歸鄉土，以最熟悉的日常生活與土地情懷為主題進行寫作，把此理念投諸於新文學、自我生存、「我」這一世代的意義之上。

整體而言，回歸現實世代與 1970 年代以來文化、政治的關係大致有三種類型：

（1）挖掘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與歷史的文化界人士；（2）黨外人士；（3）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這批活躍在 1970 年代的年輕人，正逐步成為往後引領臺灣走向本土化最主要的力量。呂秀蓮於 1979 年出版《臺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強烈地反應出其放棄追尋現代化中國的理念，以及在國民黨制式框架中成長的這批「戰後世代」，如何進行本土化要求的政治反撲。

總括而言，蕭教授以人們的主觀認同為出發點，從「世代」的角度去分析 1970 年代臺灣這一批「回歸現實世代」的年輕力量，試圖推動文化、政治上的本土化、民主化並挑戰既有政權，因此蕭教授也稱其為「軸心世代」，這批世代進而在近四十年

來臺灣文化、政治變遷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甚至 2000 年以來、至今近十年左右，他們開始從挑戰者的身分轉化成為被挑戰的、需要被世代交替的對象。但不能遺忘的是，正由於這批回歸現實世代的開拓及其努力不懈的奉獻精神，才有今日臺灣民主化的累累碩果。

王甫昌：族群議題的發展與臺灣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10 月 19 日「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王甫昌先生，講述族群議題和臺灣民主化之間的關聯。



王甫昌教授（攝影／陳世局）

王教授首先以臺灣民主化的啟動和族群議題在公領域發酵的時間點近乎同時這一點來破題，兩者幾乎同時發生，究竟是巧合？還是彼此有關？接著，王教授進一步釐清是

族群議題和民主化之間的刻板印象。臺灣民眾對於族群議題和民主化的關聯，往往認為族群問題是在民主化過程中不得不產生的後遺症，或是副作用，對族群議題的認知普遍傾向負面，而忽略了民主化對於族群平等的貢獻。同時，王教授企圖扭轉過去認為族群意識早已存在，只能作為民主化的背景或是動機因素，並無法有效地用來解釋臺灣民主轉型的重要因素。王教授以此兩點破題後，指出本次演講的目的在於重新理解「族群因素」的意義，以及「族群政治」在臺灣民主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教授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先帶我們重新檢視了一遍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一般認為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 1987 年解嚴之後到 1990 年間，這段期間的特色是消極地解除限制，以解嚴、解除報禁、黨禁為主要事件，可稱之為「自由化時期」；一是 1991 年到 1996 年總統直選為止，為積極的民主化時期，這段期間全面開放選舉，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和地方縣市長，最後則以總統直選告終。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學者普遍認為有幾項顯著特色，包括主政的國民黨在握有權力時主動地發動民主化改革；國民黨在民主化之後的選舉中，仍能贏得政權（這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國家中唯一的例外）；國民黨政權的外來性質，造成在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中，多了一層本土化的意涵，也就是人民的國家想像由中國轉移至臺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王教授的疑

問是，執政的國民黨政權在之前是以維持「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而拒絕民主化，為何在 1980 年代政權仍穩固的情形下開啟民主化改革？而 1980 年代究竟有什麼因素造成這樣的轉變？

對此，王教授首先回顧過去學者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指出目前學界對此問題有兩派解釋：一是「政治過程論」，認為國民黨內部的改革派和反對陣營的溫和派合作，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一是「反對菁英的精神理念及態度變化」，認為在經歷美麗島事件後，反對分子中的菁英不再溫和，改以較強硬的方式回應當權者的鎮壓，此舉讓年輕一代感動，因此投入民主運動，使得執政黨必須做出改變。但是上述兩種說法，都只說明了民主化是「如何」發生的，卻未解釋「為何」發生？而國民黨內部的改革派為何在這個時間點上願意和反對陣營合作？反對陣營的領袖又為何改變其面對執政黨鎮壓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王教授認為必須從族群議題來思考。

王教授認為一般民眾和國民黨中的臺籍菁英，並不認同反對政治菁英認為當時臺灣存在著族群不平等的看法。1985 年中央研究院的調查顯示，一般本省籍民眾，不論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或山地人（按：「外省人」、「山地人」為問卷調查中所使用的分類名稱），都不認為外省人的社會影響力大過本省人。但是到了 1994 年，同樣的調查顯示，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都覺得

自身是弱勢族群。為何在這段時間內出現嚴重的族群問題？之前為何沒有爆發？王教授認為 1980 年代初期的本省籍民眾，並不認為自身是弱勢族群，原因在於國民黨政權所建構的「中國國家想像」依然強大，而蔣經國推行的一系列「吹臺青」政策，使本省籍菁英可以進入國家體制，因此本省籍民眾和菁英並未感到不滿，反倒是外省籍第二代菁英對蔣經國的政策明顯感到不滿，認為外省人才是在臺灣被打壓的弱勢族群。

相對地，本省人的族群意識為何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急遽發展？王教授認為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反對分子開始調整對抗國民黨政府的策略，過去單純要求民主化的聲浪被國民黨以不斷開放增額民代名額化解壓力，因此黨外反對分子開始醞釀新的國家想像，企圖取代國民黨政府的中國國家想像。在黨外的臺灣國家想像中，強調臺灣的前途必須由臺灣居民共同決定，這個舉動引發了族群議題的爭論。在舊有的中國國家想像中，為了維持「法統」，中央政府必須有各省籍代表，因而以外省人占絕大多數。實際上，外省人在臺灣人口比例中僅占 14%，在國家想像改變之後，這點被認為是外省人對本省人的政治歧視表現。在這種氛圍之下，外省第二代菁英分子認為自己是臺灣的政治弱勢族群的想法就遭到嚴重的反擊，由民進黨籍立委吳淑珍以新的族群平等概念，就中央政府中外省籍的優勢比率質詢行政院長俞國華一事，便可看出族群議題已是立法

院中兩黨所關切的重要議題。

在此，王教授又提出一個新的想法：臺灣民主化的關鍵轉變到底為何？過去普遍認為是蔣經國下令解除戒嚴。但是王教授以族群議題重新檢視後，認為 1991、1992 年的國會全面改選才是民主化的關鍵轉變。原因在於蔣經國雖然解除戒嚴，但在國會中仍堅持應維持一定比例的「大陸代表」，對於當年隨政府撤退來臺的外省籍國代，蔣經國也堅持讓他們自願退職，而非強迫退職。這兩點被王教授認為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最大的障礙。其中，堅持「大陸代表」制這一點在立法院引爆激烈的省籍衝突，本省籍立委不論黨籍都反對這項方案，也因此 1989 年的立委選舉中，國民黨得票率大跌。但在這次選舉中，不再受制衡的外省籍第二代菁英當選者頗多，打破了外省人無法在選舉中獲勝的迷思，也削弱了必須設置「大陸代表」保障名額的呼聲。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順應本省籍的民意，推動國會改革方案，不再堅持大陸代表制和自願退職方案，並和民進黨中的溫和派合作，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讓臺灣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最後，王教授指出這場演講希望讓大家了解到，族群議題在臺灣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大家想像的來得重要；同時在族群議題和政治問題結合時，相同族群間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另外，對於族群議題的負面觀念，王教授澄清指出，族群議題和種族主義不同，種族主義是傷害民主政治的思想，要

極力避免。但族群議題是為了追求族群間的平等和對抗種族主義而形成的，不可和種族主義混為一談，也希望大家不要用種族主義來看待族群議題。

會後，國史館呂館長詢問族群意識的覺醒是否和政治有關？王教授則持肯定態度，認為族群意識的起源在於不平等，像美國的族群問題起因於經濟不平等，而臺灣則是政治不平等，因此在臺灣，族群意識的確有被政治操弄。

演講活動

近代中國宗教發展系列 講座

地點：國史館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

時間：自民國 103 年 3 月起陸續
推出

演講資訊請屆時瀏覽國史館官網
<http://www.drn.gov.tw>